

社会学原理

〔日〕富永健一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0100498

091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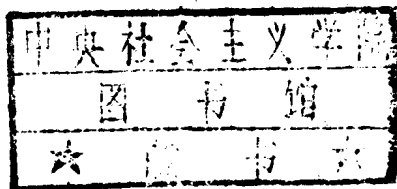
201004983

社会学原理

〔日〕富永健一 著

严立贤 陈婴婴 译
杨栋梁 陈庞 鸣

0139/11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1992

(京)新登字028号

社会学原理

富永健一 著

〔日〕岩波書店1986年12月18日第一次印刷发行

社会学原理

〔日〕富永健一 著

严立贤 陈婴婴 译
杨栋梁 庞 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密云华都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开本 12.5印张 322千字

1992年3月第一版 1992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ISBN 7-80050-250-3/C·25 定价：7.50元

本书的文献引用方式

为与近年来普及于欧美专业性杂志的学术论文中的文献引用方式统一，也为了节约篇幅，本书没有采用文献注的方式，而是在正文中用（ ）注出著者姓名、出版年代、页码。请读者参照书后的引用文献目录，按著者姓名的字母顺序和出版年来对文献名称进行检索。文中的注全部为实质性的注解，按编号附于各章章末。

文献有不同版本的场合，文中的出版年是我直接引用的版本的出版年，我将引自第几版用左上角码标于出版年之前（例如：⁵1972表示引自第五版，该版发行于1972年）。在卷末的文献目录中用（ ）标出初版的发行年代。页数全部为原著的页码，有日译本的场合在卷末的文献目录中标明。在有译本时尊重译本，这是对译者应有的礼貌，我标明原著的页码决不是对译者不尊重。我采用这种方式的主要理由在于，如果仅标明译本的页码，在写西文论文时会很不方便；而将二者都记入文中又太繁琐。此外，在引用著作集或全集的场合记为：Werke 1956—83:8（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或Works 1823:V, Œuvres 1977:IV，著集作1966—71、I—II（如洛克著作集第五卷、圣西门著作集第四卷、有贺喜左卫门著作集第一一二卷）。

中文版序

在我的交往亲密、值得信赖的年轻的中国朋友严立贤、陈婴婴、杨栋梁和庞鸣的帮助下，我的重要著作《社会学原理》一书的中文版得以出版。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

社会学是在19世纪作为对当时西方社会中的现代化和产业化所带来的社会变动进行研究的一门学问而在西欧产生的，位于亚洲的、均属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的中国和日本的社会学都从输入19世纪欧洲的社会学开始。但是，在中国和日本，由于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以及与西方相比现代化和产业化的落后性，西方的社会学并不能直接套用于对本国社会的分析。因此，中国的社会学和日本的社会学都经历了西方派社会学与本土派社会学之分裂这一共同的命运。这里所谓的“西方派社会学”系指暂时把与西方不同的本国的社会现实用括弧括起来，从由西方人创造的诸学说中掘其精华，纯粹作为理论而接受之，站在与西方人相同的平面上进行批判的吟味、雕琢、修正和综合。在这种尝试中，达到最高理论水平的成功例子可推举中国的孙本文和日本的高田保马。所谓的“本土派社会学”与西方派社会学相反，将不适合本国社会现实的西方诸学说首先用括弧括起来，深入本国的传统社会，尤其是占人口半数以上的农村社会，意在挖掘其社会文化的特质。中国的李景汉和费孝通、日本的铃木荣太郎和有贺喜佐卫门可说是本土派社会学的代表人物。

从这种二分法来说，我本人属于西方派社会学者，这可以从本书中出现了大量的西方社会学者们的名字这一事实得到证明。但是，至少在以下两个特征上有两个保留条件。第一，我属于二

次大战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与上述战前派相比，我所目睹的是现代化和产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因而与西方社会的差距越来越小的日本社会。第二，我不仅仅搞理论社会学，还参与了运用社会调查方法对日本社会进行的实证研究，因而我的社会学理论决不是象战前的社会学理论那样将本国的社会现实用括弧括起来，仅凭大脑想象的理论，而是在反映本国的社会现实之上的理论。尤其是我的社会学研究是从对社会变动——现代化和产业化——的研究开始的（富永健一：《社会变动的理论》，岩波书店，1965年）。这一事实使得上述两个特征更加明显。我之所以选择了社会变动这一课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大学毕业的1955年正是日本高速经济成长的开始期，我开始社会学研究的时期正是日本的高速经济成长带来了日本社会的急剧变动的时期。

1984年，我首次应天津南开大学的聘请，获得了为中国社会学的恢复作多多少少的帮助的机会时，他们所期待于我的，也仅仅是介绍“西方社会学”。我刚在南开大学校内的宿舍住下，讲课还没有开始，就有热心的研究生们来拜访，他们接连不断地向我提出了有关美国、欧洲和日本社会学研究的状况及文献导引等许多问题。这些一心想尽快地填补30年中国社会学之空白的真挚的青年研究者们（本书译者中，严立贤和庞鸣就是其中的两位研究生，杨栋梁当时是南开大学的年轻教师，陈婴婴是在日本认识的）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决定竭尽全力地完成他们所期待于我的角色。但是，讲起“西方社会学”——他们所说的“西方”也包括日本——我总是不能抑制我是一个东方人而不是西方人的感情。因此，我在讲课时开宗明义地申明：“我同大家一样，是一个东方人。我所考虑的问题也同你们一样，是对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来说，现代化究竟是什么。”实际上，一到中国，作为一个旅游者，进入我的眼帘的是：中国人的生活状况仅仅相当于日本人30年以前的水平，因此，我感到现代化作为一个课题和问题，确是两国所共有的。

如果不算居住在满洲时期的东北的少年时代(1941—1945年),我的中国体验只有1984年和1987年的各两个月,但印象却极为深刻。我重新认真地阅读了马克斯·韦伯、清水盛光和牧野巽等许多西方和日本社会学者研究中国的杰出著作,以及孙中山和毛泽东等人的著作,对我以前的现代化理论进行了再探讨,其结果体现在在本书的第40节及作为本书姊妹篇的我的另外一本著作《社会结构与社会变动》(1987年出版,此书已由董兴华译成中文)的第25—27章对中国和日本现代化的比较分析中。我的社会学理论虽然是很抽象的一般理论,但其根底却是除贯穿于西方学者的诸研究中的西方历史经验的考察之外,加上以日本和中国的历史经验为基础的考察。在这个意义上,我与阅读本书的广大中国读者的心是相通的。我深切地感到了其中的意义。

最后,借此机会向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的苏驼主任(1984年)及全体工作人员,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张琢和张萍,向翻译我编著的《经济社会学》、创造了我同南开大学联系的最初契机的李文光和杨栋梁等对我的友谊表示感谢,对翻译本书的四位译者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愿本书能够为日中友好作微薄的贡献。

1988年7月1日我的生日于东京。

富永健一

序

“社会学面临着理论的危机 (Theoriekrise)”，这是西德社会学理论家卢曼的《社会系统》一书序言中的第一句话。卢曼认为社会家目前处于被一种阀所壅塞、泡沫泛起、复杂性大量产生的状态。要摆脱这种状态，社会学必须去努力寻求与以往不同的理论构想。卢曼认为在社会学内部找不到能够成为这种新的理论构想蓝本的东西，他主张应当到属于一般系统论的自我参照系统理论 (Theorie selbstreferentieller Systeme) 中去寻求这种理论构思 (Luhmann, 1984: 7—29)。

卢曼的“社会学正面临着理论危机”的判断是否正确呢？近年来，在社会学中，功能理论、互动理论、现象学的行动理论、批判理论等“流派”纷呈，相互交错，表现出丰富的多样性。如果认为“危机”一词就是意味着令人绝望的末日的話，那么把上述现象称为危机显然是不恰当的。假如我们使用“危机”这个词，那也只能是指在发展论上的阶段转换期中出现的某种迷惘。那么又为什么说目前是一个阶段转换期呢？我认为在下述意义上，目前对于有志于构筑社会学理论的人来说，的确是一个转换期。

这里所说的理论是指一种分析的框架，它贯穿于社会学的各个研究领域，并能将社会学的各种法则统合为一个整体。在社会学史上，为实现这种理论整合所作的努力可分为几个发展阶段。扼要地讲，19世纪中叶自孔德至斯宾塞为第一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滕尼斯、迪尔凯姆、齐美尔、马克斯·韦伯、帕累托等社会学巨匠辈出的时代为第二阶段（稍后还有麦基佛和我国的高

田保马)；20世纪中叶由帕森斯、默顿、霍曼斯等功能主义理论家所开创的时期为第三阶段（这一时期希欧洲有舍尔斯基、柯尼和阿隆，他们的成果也不可忽视，但在第三阶段，理论上领导世界社会学的终归还是美国的社会学）。如果认为构成第三阶段核心的主要是帕森斯，那么应当说，随着1979年帕森斯的逝世，第三阶段也结束了。现在我们必须进而寻求第四阶段的新的社会学的综合。在这种交替时期，相继出现了各种论战及各种自命为“新”的观点，造成了理论上的纷乱局面。这一阶段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应当是什么呢？对此我们应当有自己的看法。

目前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呢？很早以前就曾有人疾呼：应当否定帕森斯而前进。应当变革范型理论——这种来自科学史研究方面似乎很正确的意见也受到一些人的欢迎。不过且慢，我以为假如这些意见是建议我们否定继承第三阶段的遗产的话，那么它们将阻碍社会学在不断积累当中进步，实际上这些意见在社会学中也并没有占据正统派的地位。这里让我们来回顾一下社会学史。第二阶段的学者们正确地继承了第一阶段的遗产，在此基础上发展了第一阶段的理论。这一点在迪尔凯姆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迪尔凯姆的起点正是孔德、斯宾塞的终点。与此相比，德国的社会学则是从根本上背离了英法启蒙主义的传统。尽管如此，无论是滕尼斯、齐美尔还是韦伯，他们都与迪尔凯姆同样继承、发展了英法启蒙主义遗产中的现代化理论、合理化理论、社会发展理论。第二阶段的这些遗产后来又为第三阶段的学者们所全面继承，并在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这些理论。正是帕森斯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引进了迪尔凯姆、滕尼斯、韦伯的理论，并使它们牢牢扎根于美国这块世界社会学的僻壤上，从而使美国的社会学成为世界性的社会学。

我们谈到这些事实决不是单纯强调传统而认为一个学科陷于停滞是件好事。第二阶段对第一阶段的革新把社会学带进了一个至今享用不尽的思想宝库。在第三阶段中，人们给这些思想以明

确的理论定义，使分析水平发生了一个飞跃。然而，所有这些仍是作为尚未完成的东西摆在我们面前。正如帕斯卡尔所说的，一切科学总是不完善的，为使科学达到完善的境地，必须一代接一代地对它们进行补充。这是一种不断积累的进步，或象波普尔说的是一种渐进式的进步。我在其他场合曾对“范型理论变革”的观点提出过疑问，并详细论述了提出疑问的理由，但我对波普尔的这种渐进式进步的观点却深信不疑。现在有不少人正在探索社会学理论在帕森斯之后的发展方向，开始试着踏过帕森斯这一阶梯来构筑新的理论。上述卢曼的系统理论就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哈贝马斯的交流行动理论（Habermas, 1981）、亚历山大提出的“新功能主义”（Alexander, 1985）等。本人虽不才，也愿与这些欧美学者为伍，在居于世界极东一隅的日本，加入他们的行列。正是抱着这种愿望，我写作了这本书。

卢曼，哈贝马斯，亚历山大都是将自己的中心概念置于文章的标题而展开他们的理论的，那么，我的中心概念是什么呢？在这本书中，我想在本书的标题——《社会学原理》中去寻求这个中心概念。“社会学原理”当然可以看作为一本极一般的教科书的题目，但是假如认为教科书的定义是自身不含有新意、没有个性、仅仅停留在某一学科现有的水平上、集学习这一学科时所必须了解的既存基本知识之大成的著作，那么本书就不是一本教科书。我所说的“原理”，是指那种贯穿于各个个别研究领域之中的社会学法则意义上的理论构筑。我认为从目前的社会学的现状看，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这种已经成为一种既存的基本知识的原理。前人的功绩，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无数部件，可以作为构筑这种理论的材料，我们应当充分去利用它们；但这还不是构筑这种理论的全部部件，因此还需要我们造出新的部件，而最重要的是要靠我们自己绘出装配这些部件的蓝图。这些部件的选择、补充以及组装的蓝图的全部，简单地说是所说的原理。如果问本书中有什么新的、值得夸耀的中心概念的话，我想回答说，那就

是这种意义上的原理本身。

上面我列举了不少外国社会学家的名字，但毫无疑问，本书是一本用日语写作的日本社会学著作，因此在这里我还应当就日本的社会学讲几句话。在日本的社会学界，自我们上几代的先行者开始，致力于提出可以纵观整个社会学的统一的理论体系的传统，一直存在，连绵不断，无论他们的研究是否冠以“原理”的标题。如高田保马的《社会学概论》、藏内数太的《社会学》、清水盛光的《群体的一般理论》等就是我曾熟读玩味的上代社会学的遗产，而在我们这一代及后几代中似乎还没有产生什么可与此相匹敌的著作。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由于社会学研究中专业分工的加强，社会学的概论书往往是由不同专业的作者合作完成的，每个著作承担涉及自己专业领域的那一部分，这已经成了约定俗成的惯例。当然，我承认以这种方式写出的概论或讲座中有些优秀的成果。由于采用了许多专家合作的形式，能够在全部内容中都保持较高的水平，这是它的一个优点。本人过去也曾参加过这类书的写作。不过我们必须认识到，用这种方式决不可能写出一部真正完整的书。如果说本书有什么不同于上述著作的优点的话，恐怕就在于在写作本书时作者始终努力靠一个人的智慧使这本书成为一本完整的书。

为什么现在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如此之难呢？究其原因，还是由于当前社会学所处的环境与上几代的环境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上几代人的时代，社会学尚处于建立的过程中，社会学研究的专业分工很少。在那个阶段，首先要提出社会学的基本理论，这是建立这门学科的第一步。现在这个阶段早已成为过去，在世界范围内社会学家的数量急剧增加，同时各专业领域的专业分工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在这些专业领域中，专著与学术论文如洪水般汹涌而来。另一方面，由于国际化的迅速发展，处于第一线研究者每年都要写作供国际会议用的西文论文，而这些国际会议、又都是按不同专业领域分割很细的专业会

议。在每个专业领域中都集聚了专攻这一领域的“专家”，如果一个人离开本专业片刻去从事其他研究，那么在这般时间里会不断地出现新的东西，等他发现了这些新东西时自己已经很难赶上了。在这种情况下，基本理论研究无法作为一个个别的专业领域，多少有些夸张地说，我们这代之后的社会学家们多多少少都是生活于这样一个世界当中，“过去的美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于是现在的社会学就成了所谓没有基本理论的学科。假如分析一下我及我以后的几代学者中都很难写出新的基本理论著作这个事实，恐怕是可以得出上述结论的。 X

我在本书中所主张的，无非就是要克服这种随波逐流、满足现状的状态。在以往的社会学研究中，譬如研究家庭，研究组织、研究地域社会、研究社会阶层的学者，他们都把各自分散独立的“小房间”看作一个“整体社会”。这是一个个的所谓“村落共同体”，在它的内部积累了研究者之间的密切的社会关系，但由于这些社会关系没有超出这些共同体的范围，这些学者们几乎完全没有考虑社会学这个“大房间”，即“国民社会”的问题。这样，每个个别领域的共同体不断充实，而社会学这个国民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却因此被分解并逐步衰弱。这样是不行的。无论社会学的专业如何分化，如果不依据一个法则从理论上将它们统一起来，那么把社会学当作一个国度来看的主张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仅存在村落共同体而未形成国民社会的社会是封建社会而不是现代产业社会。社会学这个国度应当是一个现代产业社会的国度。

为此，我在本书中采用了这样一种方法，即尝试着使“国民社会”水平上的一般理论与“共同体”水平上的中程(或小范围)理论充分结合。我不赞成卢曼只把社会学理论放到高度抽象的层次去研究，使之过分全面地依赖社会学之外的一般系统理论的做法。如果一般理论自身只是为数众多的“共同体”之一，与家庭、组织、地域社会、社会阶层，国家等都没有关系，它只在一

种抽象的观念的思索中度日，那么个别“共同体”的人恐怕也就不会把理论研究当作与自己有关的活动了。因此，我在本书中所追求的XI的是在我自己的头脑中将一般理论与中程和小范围理论结合起来。打个比方说，我首先是使用抽象符号将一般理论命题记录在卡片上，把它们放进提包，带着他们到各个小房间去学习，然后用学到的东西代替卡片上的抽象符号代入各个命题。这种访问对我来说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工作。理论的素材不是存在于那些小房间之外，而是存在于小房间之中。这是我的信念，但是如果不是带着这些用符号记录理论命题的卡片去访问那些小房间，那么尽管可以详尽地了解各个小房间的个别情况，却由于缺乏理论化的工具而不能形成理论。只有携带着工具去搜集材料时才能形成理论。当出现找出一种新的理论综合的机会，使社会学向上述第四阶段发展时，一般理论与中程和小范围理论结合而形成的“原理”获得新生命力的时机也就逐渐成熟了。

这里请允许我作一些有关我个人的回忆。我认为，就我本来的资质来说，我是适于研究基本理论与学说史的。因此，自30年前我投身于这门学科开始，我就一直抱有早晚要完成这项工作的愿望。但是随着作为一个专门研究人员的经验的增加，对社会学中个别领域的特殊研究的兴趣不断涌来，研究基本理论和学说史的愿望不知不觉被无限期地搁置起来，渐渐使人感到它象梦境一般遥远了。在这期间，我曾使自己专注于以下五个研究领域：

(1) 社会变动、社会发展、现代化、产业化的研究；(2) 社会阶层与社会移动的实证与计量分析的研究；(3) 经济社会学、即经济与社会关系问题的研究；(4) 产业社会学及组织分析的研究；

(5) 与政策论相关的日本社会现状的研究及使用社会指标等进行的福利研究。这些课题本应按部就班地逐一进行，但是完成第一项课题出版了《社会变动的理论》(富永，1965)一书之后，XII出于现实的考虑，我不得不同时进行第二项至第五项工作。这样一来，虽然说其中每一个课题都单独发表了许多论文，但却很难

着手将它们归纳成书。这些成果都以高度浓缩的形式被收入本本，然而，将它们变成自成系统的专著，这将是我今后的课题。

正在我进行上述这些工作时，我记得是在1976年，有两个出版社同时向我约稿，这使我又重新想起了我曾经企盼过但却如梦一般逝去的基本原理与学说史的研究课题。这两本书一本是已经出版的《现代的社会科学家——现代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与理念主义》(富永,1984)，另一本就是目前终于到达完成阶段的本书。当时正值我在主持关于社会阶层与社会移动的大规模的全国性调查(富永,1979)，我的脑子里充满了掌握统计分析的手段和计算机操作等问题。这些大量涌来的任务，使我的学习和研究被分为计算机、学说史和理论三个部分，——因为我认为基本理论和学说史是最适合我的工作，所以不愿拒绝出版社向我约稿的两项任务。但我感到这三项工作齐头并进终归是不可能的，因此我提出将出版社的两个稿约暂且推迟。1979年我在首先完成了上述调查项目之后，决心在新的环境下转向理论与学说史的学习。1981年——1982年的一年间，我前往西德波弗姆大学(其间还曾到过曼海姆大学)访问，为此我必须自己事先安排出进行德语强化训练的时间，这带来了我研究工作上的一个转折。这样，归国后我终于得以着手写作上述两部著作。1984年先完成了《现代的社会科学家》一书，而现在正在努力完成这第二本书。

本书最初是岩波书店的木村秀彦先生作为岩波丛书中的一册向我约稿的，因此我开始也根据丛书要求的篇幅制订了写作计划，写作过程中也是努力按照这个计划去做的。但是，最后我终于意识到，我的稿子是无法压缩到适合于丛书的篇幅的。结果只得改变原来的计划，并请求现在的责任编辑加藤亮三先生将此书作为单行本出版。因此，我要向木村先生和加藤先生表示我的歉意，我使他们等待了很长时间，最后却改变了预定的计划，并把这一结果强加给他们，给他们增添了不少麻烦。同时，对于他们能把这一切都接受下来我要表示衷心的感谢。

Ⅷ

去年五月，我参加了在西德召开的社会阶层研究国际会议，并在会上宣读了论文。直接动笔写作本书是在参加这一会议之后的大约一年零一个月的较短的时间中，但这本书孕育的时间已有十几年，从在东京大学每隔一年开设“社会学原论”的课程开始，我已作了大量的笔记。我感谢这期间从校方的角度支持了我的研究工作的东京大学文学部的同事们；我还想感谢始终对我的研究工作怀有兴趣的社会学系的毕业生（他们现在已经作为社会的中坚活跃在各个领域）、在校生、尤其是研究生们。此外请原谅我在这里谈一点个人的事情，我想感谢我的妻子英子，她从个人生活方面支持了我的研究工作；感谢我的长子纯一，他编写了本书的索引。

1986年6月12日

富永健一

于上高井户寓所

目 录

中文版序

序

第一编 社会学的科学理论	(1)
第一章 社会的概念与社会学	(1)
第一节 社会学的定义	(1)
第二节 社会的概念	(5)
第三节 社会与个人意识	(10)
第四节 社会与文化	(15)
第五节 社会世界、意识世界和符号世界	(20)
第二章 社会学的科学哲学	(26)
第六节 形式科学与经验科学	(26)
第七节 什么是社会学中的理论	(29)
第八节 社会学中的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	(34)
第三章 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与思潮	(42)
第九节 社会学的研究领域	(42)
第十节 社会学的研究思潮	(49)
第二编 社会的微观理论	(65)
第四章 社会的微观认识——行动理论	(65)
第十一节 个人需要社会——微观社会学的观点	(65)
第十二节 行动的概念	(69)
第十三节 行动的构成要素	(74)
第五章 自我形成与角色形成——个人层次与社会层 次的相互依存	(82)

第十四节	自我形成——社会化	(82)
第十五节	角色形成——行动系统的组织	(88)
第六章	相互行动与社会关系的类型——微观社会分	
	析	(94)
第十六节	相互行动与社会关系——四种类型的提 出	(94)
第十七节	共同社会行动与共同社会关系	(101)
第十八节	利益社会行动与利益社会关系	(110)
第十九节	市场交换行动	(115)
第二十节	竞争与斗争	(123)
第三编	社会的宏观理论	(133)
第七章	社会的宏观认识——社会系统论	(133)
第二十一节	社会在适应环境中存续——宏观社会 学的观点	(133)
第二十二节	社会系统的概念	(140)
第八章	社会结构的概念化	(155)
第二十三节	社会系统的结构分析	(155)
第二十四节	结构与功能——结构-功能分析的理论 逻辑	(162)
第九章	现代产业社会的社会结构(一)——部分社会 的结构	(175)
第二十五节	现代产业社会的社会结构——总论 ..	(175)
第二十六节	基础群体——家庭、亲族	(183)
第二十七节	功能群体——组织	(191)
第二十八节	地域社会——村落与城市	(198)
第十章	现代产业社会的社会结构(二)——总体社会 的结构	(206)
第二十九节	社会阶层	(206)
第三十节	国民社会与国家	(223)